

面的论证，揭露出“贵无”论的实质，廓清它的不良社会影响，重新确立儒家名教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理论只是为了论证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而已，以恐“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②目的在于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作辩护，体现出其具有的阶级局限性。除此之外，裴頠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些超越名教礼法的言行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从理论上对玄学“贵无论”所造成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所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

另一方面，裴頠侧重从生成论出发解释本体“道”与万物的关系，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②而老子、王弼等是从本体论角度为万物寻找存在的根据和原因。裴頠没有上升到与之相等的高度而言老子“偏立一家之辞”，^②忽视了老子“无”之概念的复杂性，没有理解到道家之“无”不是空无所有，不是虚无，只是对万物本体的最高抽象。

“无”的内部包含对立矛盾的方面，进而转化，为万物的产生创造条件。生有、生万物的“无”只不过是未形、没有展开的“道”的初始、本真状态。正是因为“道”内部的有无两个方面、两种力量使得道生万物的过程展现为从无到有有两个阶段，进而对老子的评论有失偏颇。

对于万物的生成问题，裴頠在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回避了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问题，他不能解释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生成关系，进而将万物的生成归结为“始生者自生也”，^②从而否认了事物之间相互转化，陷入了形而上学，后又被郭象发展为“独化”学说。

但也应该看到，裴頠以“崇有论”为当时名教礼制和社会等级体制作出辩护，并试图从玄学内部批判王弼

“贵无论”的流弊，这无疑丰富了玄学的内容和义涵。裴頠提出道是万物的总括，不能超越于万物之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本体存在。依此，王弼、何晏等贵无学说所言的与具体事物分离的、凌驾于物之上的“道”就不存在。裴頠从事物的相互关系、外部环境来考虑事物存在发展的原因，意图改变崇尚空谈、虚浮的个人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气，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智慧光辉。

注释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7-161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233-236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19页。

④（魏）王弼、（晋）韩康伯：《周易王韩注》，长沙：岳麓书社，1993：239页。

参考文献


[1]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

吴毅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上接第84页）

翔节度判官期间，其活动范围除凤翔府城以外，最主要的行迹就是沿秦岭两麓往来。凤翔府辖区，秦岭南麓自西向东从宝鸡县、太白县、郿县到盩厔县，秦岭北麓自西向东从凤翔县、陈仓区、岐山县到扶风县，构成了两条东西向的苏轼关中行迹线路。以苏轼行迹为节点，以秦岭为依托，开辟苏轼关中行迹文化旅游线路；同时以苏轼关中行迹、诗文创作为素材，研发苏轼、秦岭相关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在体验西府文化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苏轼、了解关中乃至陕西。

参考文献

[1]傅璇琮等：《全宋诗（第十四册）》，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清）达灵阿：《乾隆〈凤翔府志〉》。

[3]（清）韩缙：《雍正〈凤翔县志〉》。

[4]（清）许起凤：《康熙〈宝鸡县志〉》。

[5]（北魏）郦道元著，史念林译：《水经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17）。

作者简介

王永莉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西北地域文化与书法理论